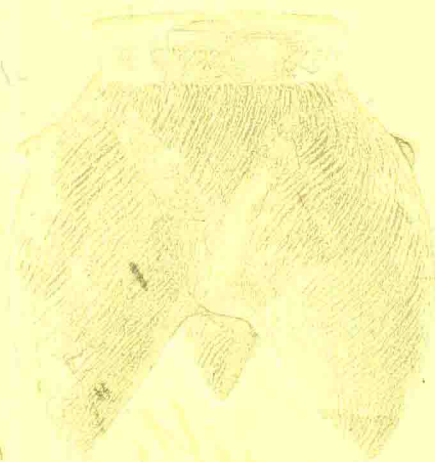


中国考古学理论
与方法
十讲

许永杰 著



科学出版社

中国考古学理论 与 方法十讲

许永杰 / 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基于许永杰教授为博士研究生及硕士研究生开设的“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考古学方法论及个案研究”课程的讲授内容编写而成,全书共分十讲:第一讲考古学史、第二讲考古年代学、第三讲考古层位学、第四讲考古类型学,前四讲是考古学的文化研究,为格物致知;第五讲文化与族群、第六讲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第七讲历史考古学、第八讲民族考古学、第九讲聚落考古学、第十讲情境考古学,后六讲是考古学的社会研究,为透物见人。收录在十讲中的文章多是依许教授讲授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时的所得写成的论文,因此,说是讲理论与方法,说是源自课程讲义,但却不是纯粹的理论方法的讲授,不是讲义的照搬,而是理论指导下的方法运用的考古学研究个案,或说成是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演示。

本书适宜考古学、历史学及相关专业高等院校师生、科研院所研究人员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十讲/许永杰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8
ISBN 978-7-03-058370-3

I. ①中… II. ①许… III. ①考古学-中国 IV. ①K8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67657号

责任编辑:樊 鑫/责任校对:邹慧卿
责任印制:肖 兴/封面设计:金舵手世纪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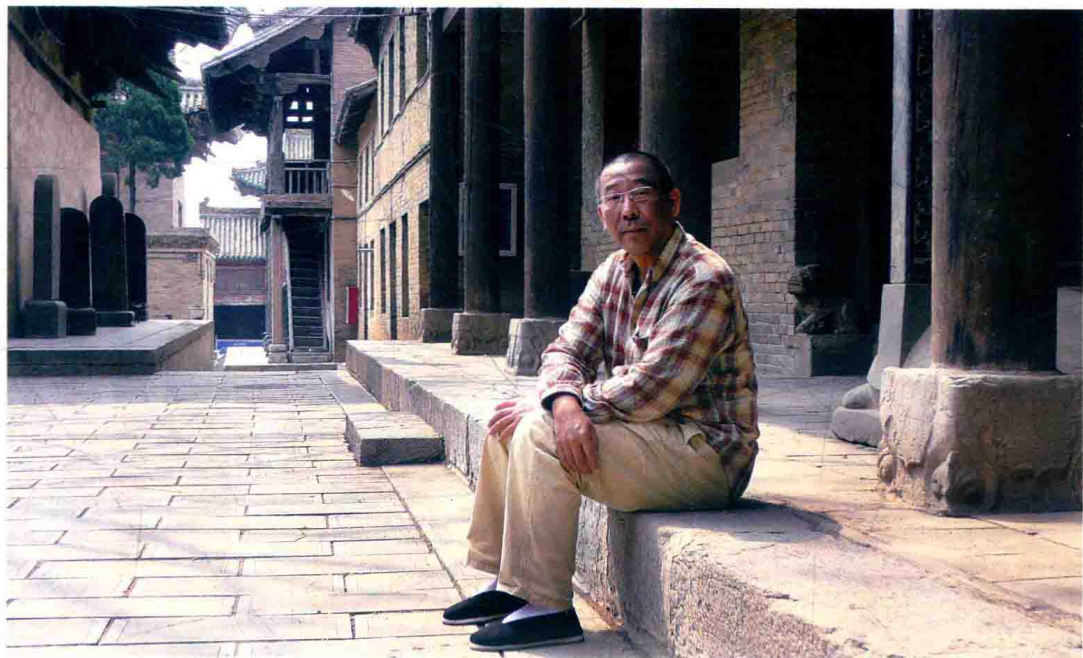
2018年8月第一版 开本:720×1000 1/16

2018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3 插页:1

字数:451 000

定价:6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许永杰 1957 年生于北京。小学、中学和知青在长春度过。1978 年春考入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先后在甘肃省博物馆、吉林大学、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山大学供职。现为中山大学考古学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南中国海考古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本科、硕士和博士阶段师从张忠培先生学习中国汉代以前考古学。有过在黑龙江流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考古发掘的经历。著有考古学专著多部和考古学论文数十篇。

不忘典谟 致力传承

——听许永杰讲中国考古学理论

卜 工

文如其人。读许永杰《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十讲》(简称《十讲》)如听他讲课,举手投足的神情,侃侃而谈的情景都会出现于脑际。我们大学同窗,研究生师出同门;曾同在吉林大学中国北方考古研究室工作,田野考古多年搭档;后都在广东供职生活,长期接触,经常交流,非常理解他不忘典谟训诂,致力考古传承的专业情怀。

《十讲》是许教授为中山大学考古专业博士生开设的课程,内容充实,追求新意,能够体现他考古研究的手眼身法步。书中关于考古学史、考古年代学、考古层位学、考古类型学、文化与族群、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历史考古学、民族考古学、聚落考古学、情境考古学均有涉及。说是理论与方法,但却不是纯粹的理论与方法,而是理论指导下的考古学个案研究或演示。尊重前人成果,注重学术历史,点评客观公正,理论与实践结合,《十讲》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教学效果。

以个案研究的推演为中国考古学理论存正是《十讲》的贡献。若干年以来,国内外不时出现指责中国考古缺乏理论的声音。任何学科的理论都存在发生、发展和成熟、完善的过程;既非一蹴而就,一日之功,也非一劳永逸,一成不变。如果说中国考古学的理论需要完善,那肯定既中肯又客观;倘若根本不承认理论的存在,那无疑是罔顾事实,信口雌黄。

俗话说“三十而立”。中国考古则有三十年左右上新台阶的周期特点。20世纪20~50年代是中国考古的草创期,50~80年代是建设期,80年代到21世纪头十几年是发展期。未来的中国考古则必是与时俱进,与世共舞的开放期。不同阶段考古学面临的主要矛盾不同,解决的任务不同,提出的课题不同。草创期思考怎么挖才好,研究挖出的东西是啥样;建设期关注正确挖的方法,研究挖出的东西都有啥。发展期的焦点是科学挖的规范,研究挖出东西有啥用。开放期的任务当是在国际舞台上演绎中国模式,探索考古学为人类命运

共同体建设服务。如今的中国考古早已超越了当初按深度发掘的阶段，发掘资料整理和研究取得长足进步，科学技术手段的大量使用，使得信息的提取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其发现与研究的影响力已经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

可能是这个原因，中国考古学经常遭遇误解、戏说或调侃。诸如是否科学，有无真实性，与盗墓有何区别，等等。所以，认真学习中国考古学发展与进步的历史就显得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哪学、跟谁学、学什么，往往决定后来的研究取向。或言必称希腊，热衷洋人说教；或文必引经据典，推崇考据；或追逐潮流，偏爱科技手段，都无可厚非。中国的田野考古虽是国外引进，但学科的创立和发展却根植于中华大地，具有本土化的特点。其一，理论来源完全是从中国的实践和材料中总结出来的，并为实践证明具有科学的指导意义。其二，这个理论有自己特定的内容和具体的标准体系。所谓的中国特色有两个原则必须坚持，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的国情。其三，服务于国家建设与发展的特点。中国考古的不同发展阶段就本质而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阶段性的客观反映和必然结果。国家兴则考古兴；国家强则考古强。因此，考古学理论本土化特征深深地烙有时代的标记。从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到中国古代文明原生性论述；从苏秉琦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到文明多样性的“满天星斗”说，都可以读出鲜活的时代背景和丰富的历史内容。《十讲》正确反映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实际过程，其志可嘉。

近代中国考古以走上田野为标志，主要是同“软”遗址打交道，情况比世界很多地区的“硬”遗址复杂。“软”遗址难以保存，侥幸残留，也仅仅是建筑的基址部分，难以发现，难以辨识自不待言；若谈到保护则更是困难重重。加之，中国古代文化年代久远，类型多样，连绵发展，不曾中断；中华文明多样性、连续性和继承性特质造就了古代遗存不仅层累叠压，各种遗迹现象交织纵横，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文化遗存往往如乱麻缠绕，错综复杂。遗迹平面形状多是支离破碎，晚期遗存埋藏深度往往超过早期遗存，如此等等。能够将准确率维持在90%以上的成功发掘，要求现场工作主持者必须具有深厚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些客观要求决定了中国考古从发掘阶段获取资料的伊始，到整理认识、研究阐释，保护利用的全过程必然要闯出自己的新路。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考古果然不辱使命，达到了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作为，独步于世界考古舞台的境界。

不了解这段历史，自然不懂其中的奥妙、甘苦、艰辛。以为考古发掘与挖壕沟没有区别；凭手感、靠经验的发掘就是田野考古的全部。那些指责中国考

古学没有理论者，恰恰应该认真读一读《十讲》，从考古层位学的基本功开始补课：闻一闻中华泥土的芳香，体验手铲之神功；品一品中国考古人是怎样从“软”遗址中刮出硬道理，将学来的“地层学”升华到“层位学”；想一想古老的奇迹是怎样在神奇的土地上被发掘出来，不胜枚举的中国创造与智慧结晶在世界上有哪些影响；比一比东西方文明道路的异同与辉煌，五彩缤纷的世界又是怎样酝酿多样性文明的荣光。正所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不过，人世间有个基本的道理，那就是你永远不可能感动根本不喜欢你的人；同理，你永远教不会玩命装傻的人。

不忘先贤，致敬传统，《十讲》用心良苦。阐述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便不能不提及中国考古难以忘怀的前辈导师、精神领袖；致敬传统，尊崇经典，才能致力传承。《十讲》的尝试给人印象尤为深刻。从梁思永、夏鼐、苏秉琦、宿白，到邹衡、俞伟超、张忠培，无数为考古学理论创新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前辈组成学术梯队，前仆后继，砥砺前行，不断尝试，总结经验，创造出可以传世的经典之作，形成泽被后代的知识体系。他们是当代民族的精英和脊梁，是中国考古人的骄傲和自豪。讲述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传奇，使之成为中国考古学子耳熟能详的“家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正是《十讲》的至高境界。梁思永的“后冈三层”，夏鼐的“填土陶片”，苏秉琦的“西安三层”是见证层位学发展的典故；“白沙宋墓”、“商城郑亳”、“元君庙模式”是中国考古学史上可圈可点的研究范例；中国文明的“土生土长”和“满天星斗”的形象概括，更昭示出中华文明的神采飞扬和博大精深；“区系类型”、“曲村经验”、“华渭模式”既是中国考古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是理论概括。认真加工提炼之，并将其转化为特殊含义的词汇，可以再现中国考古的经典，讴歌中国考古的传奇，弘扬中华传统。这是中国考古学研究 with 通识教育的重要任务，也是新时代中国考古的新课题。《十讲》先人一步的积极探索，值得称道。

《十讲》的内容集中在正确获取、客观整理、准确认识和科学解读古代遗存四个方面，是相对完整的体系。这令人想起 20 世纪 80 年代，当时吉林大学的青年教师陈雍、许伟曾经提出中国考古学由层位学、类型学、年代学和阐释学四部分组成。分别相当于四驱汽车的轮子——层位学和类型学系前驱，年代学和阐释学是后驱，同为考古学发展动力之所在。时光荏苒，青年教师已然两鬓斑白，但意气风发的学术敏感性和前瞻性却随着时间推移得到充分证明。中国考古的未来，极有可能是上述内容的延伸与升华，田野考古发掘走向集约化，科题引领研究实现制度化，遗产信息集成达到系统化，阐释考古成果进入产业化。

《十讲》关于阐释学的内容最是充分。20世纪80年代,以红山文化重大考古发现为契机而展开的中国文明起源大讨论,将考古阐释学推到学术的前沿,之后的“探源工程”,乃至当前正在进行的“互联网+中华文明”战略,都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舞台、注入活力。为使文物“活起来”,理论必须先要挺起来,将东方文明的标准提出来,把中华文明的逻辑搞明白,把文化传统的优势捋出来,把未来希望献出来。

历经百年探索,考古学对中华大地诸区域、诸时代、诸考古学文化人们共同体如何发生,怎样发展,贡献何在形成系统性认识;总结出中华文明原生性、多样性和特殊性的理论意义,揭示出文明进程中数量众多的闪光之点、质变之点和中华文明基因序列的连接之点。然而,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并不满足于科技考古春色满园,文物讲座好戏连台,境外考古频频出击,外国专家逐渐脸熟。因为这些毕竟只是中国文化知识的普及,传统教育的时代回归,中国崛起的舆论呼唤,而非考古学理论创新的本身。当前,客观回答中华文明的标准元素是什么,基本内容有些啥,核心特色在哪里,才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意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无疑是中国考古学的座右铭。

三十年前,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讨论与宣传使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广为人知、家喻户晓。而今,中国考古发现的超大聚落、超级工程、超常祭典、超凡礼器将在进一步论证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统绪不绝如线,中华传统博大精深,中华文化独领风骚方面做出更大贡献。古代中国乃至东方世界的文明标准正在逐渐浮出水面。庙底沟文化杨官寨超大聚落、红山文化牛河梁规模宏大的祭祀圣地,能够说明土地人口资源储备能力;良渚文化古城水坝、陶寺观象台和豪华墓葬等超级工程,可以见证知识礼仪体系的发达程度和社会管控水平;石家河文化特殊符号和大量祭祀遗存与陕西神木石峁古城石破天惊,都成为解读中华文明的新亮点。考古学科长期建设与考古资料百年积累,势必铸就通向理论高峰的天路。

显然,中国考古学理论创新已经走进新时代。面对如此喜人的形势,研读许永杰《十讲》,由衷地感叹中国考古的光明前景!毫无疑问,中国考古学已经成为助力国家发展的重要学科,将为中华文明的软实力不断注入新鲜活力,将为国人的文化自信扬起破浪风帆,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诠释历史必然!

目录

第一讲 考古学史

关于重挖著名遗址的思索	003
“华县渭南模式” 的创建与实践	020

第二讲 考古年代学

再审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的年代关系——以叠压打破和 共存关系为视角	031
--	-----

第三讲 考古层位学

考古层位学札记三则	057
中国考古层位学的里程碑之作——《西安附近古文化遗存的 类型和分布》导读	073

第四讲 考古类型学

中国考古类型学研究中单种器物研究的轨迹——以几位考古学家的 陶鬲研究为例	087
甘青宁地区陶鬲的谱系	118

第五讲 文化与族群

距今五千年前后的文化大迁徙	155
周文化形成与周人兴起的考古学考察	197

第六讲 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

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整合研究的两个瓶颈	223
冀中的西阴文化遗存与伏羲传说	242

第七讲 历史考古学

漫谈历史时期考古学的方法——从安阳西高穴汉魏大墓的 墓主推定说开去	249
禹会村祭坛是否为涂山会盟之地?	264

第八讲 民族考古学

民族考古学是什么	273
嫩江流域史前先民的生计模式——从昂昂溪骨质渔猎工具说起	284

第九讲 聚落考古学

聚落考古在中国——历程·现状·问题	293
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群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	306

第十讲 情境考古学

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情境分析	329
“陶抄”的考古情境分析	342

后记	357
----------	-----

第一讲

考古学史

关于重挖著名遗址的思索

在中国考古学的历程中，一些遗址因与一些著名的考古学家相联系，更因其发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被学界视为著名遗址。曾几何时，出于种种原因这些著名的遗址多被再度发掘。重挖这些遗址的意义何在？收获几何？应作理性分析和深度思索。本文仅以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山东章丘城子崖遗址和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为个案进行讨论。

一 关于渑池仰韶村遗址

1921年，农商部矿政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经报中国政府准许，于10月27日至12月1日，主持对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考古发掘，地质调查所的地质学家袁复礼、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和中国助手五人参加发掘^[1]。发掘工作在17个地点进行，获得一大批包括陶、石、骨、蚌、角等材质的出土遗物。

对于这样一批丰富发掘品，安特生提议：“应有名称，以便讨论。余取本地之名而名之为仰韶文化时代。”对于“仰韶文化时代”安特生估定：“予意以为仰韶纪土层属于石器及金属器时代之过渡期，与地中海左右之所谓石铜时代者相吻合。”对于仰韶文化的族属和人种，安特生以为：“据已发现之各器观之，余以为仰韶遗址，实未有文字记载以前汉族文化所遗留也。”“余个人意见，则意味仰韶文化之人种当为现代汉族之远祖，或与汉族极近之一民族。”对于仰韶文化的起源问题，安特生持如此态度：“因仰韶遗址之发现，使中国文化西源又复有希望以事实证明之。然欲完全解决此问题，为日尚远。是在考古学家、人种学家及语言学家通力合作。去固执之成见，为实诚之讨论，庶能渐达真理。尤望中国学者，对此注意，共起研究，其能贡献此学者，自更不可

[1] 安特生著，袁复礼译：《中华远古之文化》，《地质汇报》1923年第5号。

量也。”

继安特生 1921 年发掘之后，仰韶村遗址又有过两次发掘。

第一次是 1951 年 6 月 29 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调查发掘团在结束成皋广武的调查发掘工作后到仰韶村进行的发掘^[2]。从报告中可知，本次发掘的目的是为了从地层上验证该遗址中所含的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的遗物的关系，即二者原本就是一种混合的文化，抑或发掘者不小心弄混了地层上的区别。发掘区选在遗址的中心部位，即安特生所发掘的第五地点，开 2 米 × 20 米的探沟一条，依土质土色区分堆积，清理墓葬 9 座，灰坑 2 个。第一层出土近代瓷片和铁片，为“扰乱层”，第二层包括两种遗存，一种是红底黑彩或深红彩的罐或碗、泥质红陶小口尖底瓶、夹砂灰褐陶鼎等仰韶式陶片；一种是磨光黑陶、方格纹、篮纹和绳纹灰陶的豆柄、鬲、带流杯等龙山式陶片。此外，在探沟西南约 200 米处清理灰坑一个（H2），“这灰坑的发掘，可以证实第一探沟的结果，使我们能确定这里的文化是一种仰韶和龙山的混合文化”。为证明“混合文化”存在的认识，报告还举例广武点军台遗址的发现，“由于广武点军台遗址的发掘，我们便已知道河南的西部是有这一种糅杂仰韶和龙山的混合文化，仰韶村遗址也是这一类的混合文化”。

此前发掘的广武点军台遗址^[3]，包含两个时期的堆积，第二层堆积中出有细把灰陶豆、圜底绳纹灰陶罐等，当属战国时期的遗存；第三层中出有三足罍、三足鬲、直筒杯、粗把短豆等，当属龙山时代的遗存；第四、五层所出遗物，报告缺少必要的文字交代，若依“图 2-48 点军台遗址下层出土陶器”之侈口鼓腹夹砂罐、矮圈足豆以及“图 2-49 广武出土的缸底白衣黑彩陶片”之圆点、弧三角、弧线、宽带网格纹样判定，当属仰韶时代晚期的遗存。

由此可以看出，其实点军台遗址是不存在仰韶和龙山的“混合文化”的，该遗址的第三层虽出有“仰韶文化式”彩陶片，当属早期遗物在晚期堆积中的遗留，不妨碍将该层定位龙山时代堆积的认识；第四、五层遗物虽有早晚之别（其圆点、弧三角、弧线纹样的彩陶片年代较早，鼓腹夹砂罐、矮圈足豆和宽带网格纹的彩陶片年代较晚），但都属于仰韶时代晚期的秦王寨文化。因此，

[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调查团：《河南浍池的史前遗址》，《科学通报》1951 年第 2 卷第 9 期。本文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夏鼐文集》（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第 336～343 页。

[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调查团：《河南成皋广武区考古纪略》，《科学通报》1951 年第 2 卷第 7 期。本文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夏鼐文集》（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第 344～350 页。

以点军台遗址的发掘证明仰韶村“混合文化”的存在是不能成立的。即便是仰韶村遗址 H2 中出土的“一片颇为别致的彩陶，红底深红彩，是属于仰韶系统的；但器壁曲折度很大，厚度又薄，有点近似龙山系的陶器形式”，也不能证明“混合文化”的存在，而其应属仰韶时代晚期的秦王寨文化的遗存。点军台遗址真正的启发意义应是重新分析和界定仰韶村遗址不同堆积单位的年代差别。既然仰韶村所谓的“混合文化”不能成立，那么 1951 年的发掘就难说有什么学术意义了。

第三次是因仰韶大队寺沟村居民申请建房，1980 年 10 ~ 11 月、1981 年 4 ~ 6 月，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分两个年度，对仰韶村遗址进行第三次发掘^[4]。本次发掘分三个地点进行，除村民建房的路东区外，还有路西和北部两区，共发掘探方 4 个、探沟 4 条，发现房基 4 座、窖穴 41 个，出土陶、石、骨、蚌器 613 件。本次发掘的学术目的同前次一样，是为了“能够解决仰韶村遗址的地层问题”，发掘者依据层位关系将这批遗存归属为庙底沟文化、秦王寨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和三里桥龙山文化四个时期。从发表遗物看，报告的分期结果是正确的。

客观地讲，对于仰韶村遗址存在不同时期、不同文化性质遗存的认识由来已久。1935 年，梁思永在发掘安阳后冈遗址后，就曾认为：仰韶村遗址存在着诸多龙山文化的因素，“龙山极普通的篮纹、方格纹陶片常出现于仰韶；龙山主要的光面黑色和灰色陶片也屡见于仰韶。仰韶有几种陶器的形制完全属于龙山陶器形制的系统”。同时做出一种推测：“仰韶村本是彩陶文化的本土，被龙山文化侵入。”^[5]

尹达对于仰韶村遗址文化内涵的认识又较梁思永前进一步，他在写于 1937 年的文章中指出：“他在这里（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所说的‘粗陶器’大部分合于龙山式陶器特征；而‘较为细致’的第二类大部分合于仰韶式陶器的特征。”^[6]并进一步举证《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中，出自仰韶村的陶器里至少有大杯、碗形器、罐形器、绳纹罐形器、条纹罐形器、豆形器、碗形鼎等 8 件为龙山文化的遗存。因此，“从陶器的各方面分析，确知仰韶村遗址中实含有龙山和仰韶两种文化遗存；其本质各有不同，其时代或有先后。安特生最初

[4]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浉池县文化馆：《浉池仰韶遗址 1980—1981 年发掘报告》，《史前研究》1985 年第 3 期。

[5] 梁思永：《小屯龙山与仰韶》，《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5 年。

[6] 尹达：《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论安特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问题中的错误》，《新石器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 年。

命名的‘仰韶文化’，实有加以纠正的必要”。他最后的结论是：“我们分析仰韶村遗物的结果，确知其中有两种文化遗存，还看不出仰韶文化对龙山式遗存有若何影响；这也正和河南北部及河南广武所见的现象相同，这确证仰韶村的遗址是两种文化的堆积而不是两种文化融和为一之后的遗存。”

而真正将仰韶村遗址文化内涵准确区别、严格分期的是严文明写于1965年的《从王湾看仰韶村》一文，该文主要依据1959~1960年发掘的洛阳王湾遗址的分期标尺，重新衡量仰韶村遗址的出土遗物，将其分为五个时期。一期遗存属于半坡类型，二期遗存属于庙底沟类型，三期和四期遗存属于仰韶时代晚期的秦王寨文化，五期遗存属于中原龙山文化。

关于安特生1921年发掘仰韶村遗址的意义，在“纪念仰韶村遗址发现65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一些学者有很好的总结和阐释^[7]。严文明在《仰韶文化研究中几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中讲：“仰韶村遗址第一次发掘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按：指以仰韶村遗址命名一种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因为它还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和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发端。1921年以前，我们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中国有没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存，仰韶村遗址及后来一系列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才第一次宣告我国存在着非常发达并且富有自己特色的新石器文化。从那以后我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才逐步开展起来，并且从新石器时代的研究扩展到旧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张维华在会议专刊《论仰韶文化》的前言中将严文明阐释的发掘意义作了简要表述：“它揭开了中国新石器考古事业的第一页，揭开了中国考古学的第一页，为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中国近代考古学便由此为开端。”安特生认为仰韶村遗址出土的陶鬲是中国商周时期的铜鬲的前身，长方形石刀和陶刀是华北农民仍在使用的爪镰的前身，所以仰韶文化就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前身——《中华远古之文化》。苏秉琦在《纪念仰韶村发现六十五周年·代序言》中，则从仰韶文化与中国历史时期文化关系以及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角度讲：“从他第一次发表关于仰韶村遗址考古论文到他写仰韶文化为中心内容的论著，他的全部学术活动我们似乎归纳为一点，即试图以仰韶文化遗存为中心，探索中国文化起源问题。”“从探索中国文化起源，到探索中国文明起源这一总课题出发，看仰韶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确实应给以恰如其分的评价，不应夸大，不应缩小”。

[7] 《论仰韶文化》，《中原文物》1986年特刊（总5号）。

从上文关于仰韶村遗址第二次和第三次发掘的记述和分析看，其对于安特生的第一次发掘的意义并无增补或修正。

关于安特生 1921 年发掘仰韶村遗址的失误，首先是由于安特生采用的是依平均深度计分地层堆积的发掘方法，因而未能区分至少包括“印纹粗灰陶器”和“彩纹细红陶器”的两类遗存，也未能有效地清理所观察到的袋形穴遗迹^[8]。从而为中国考古学制造了一个长达数十年的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孰早孰晚之争的学案。

1921 年安特生在仰韶村遗址采用依平均深度计分地层堆积的发掘方法，是受学科发展水平的限制。1926 年，李济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也是采取的同样的发掘方法。摒弃这种发掘方法始自 1931 年，梁思永发掘安阳后冈遗址采用了依土质土色划分地层堆积的方法^[9]。正是由于发掘方法的改进，才在后冈遗址获得了以彩色陶器为特征的仰韶文化遗存埋藏在下，以黑色陶器为特征的龙山文化遗存埋藏在上的发现，才从层位堆积上获得了仰韶文化早于龙山文化的实证；也正是由于在后冈遗址准确地识别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两类遗存，梁思永才指出仰韶村遗址同样存在这两类遗存。对于确定仰韶文化早于龙山文化的认识，还有 1937 年夏鼐在甘肃宁定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中发现“甘肃仰韶文化”的彩陶片的层位学实证^[10]，以及尹达写于 1937 年的《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的详尽分析。这些都早于仰韶村遗址第二次和第三次发掘，这一学案的了解与仰韶村遗址的再度发掘无关。非但如此，1951 年的第二次发掘不但未能识别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两类遗存，其关于确实存在“混合文化”的认识还延续并强化了安特生的错误。至于仰韶村遗址包含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秦王寨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等多种遗存的准确识别，也是早于 1980 年第三次发掘的严文明写于 1965 年的《从王湾看仰韶村》一文实现的。

其次是安特生在仰韶村发掘之后，鉴于仰韶村出土彩陶与安诺遗址彩陶存在的相似性，认为仰韶文化的彩陶是西方传入的，进而认为中国的文化也是由西方传入的。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始作俑者不是安特生，作为一名严肃的学者，他在这一问题上所持态度始终是比较严谨的。几经咨询，几经踟蹰，安特生最

[8] 安特生将此称为“袋状灰层”，“此二土层接触处，灰土层每作袋状，包于红土层上部。形如长筒，而上下直径不一”。

[9] 黄景略、张忠培：《梁思永先生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纪念安阳后冈遗址发掘 50 周年》，《考古与文物》1981 年第 2 期。本文以为按土质土色划分堆积单位应始于 1930～1931 年的城子崖遗址发掘。

[10] 夏鼐：《齐家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中国考古学报》第 3 册，1948 年。